

西工文史资料

第十三辑

难忘的岁月

依依情深忆征途

洛阳曲剧史话(第三、四章)

十年“文革”亲历记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洛阳市西工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PDG

西工文史资料

第十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洛阳市西工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九年三月



本书编辑合影

自左至右 李丽萍 陈永周 王久长

(贾建民摄)

政协洛阳市西工区第五届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

主	任	陈永周		
委	员	卫正欣	王广勋	王彦杰
		朱学升	刘春晓	李永庆
		李丽萍	李治民	李波伟
		武运良	赵 汐	赵林洲
		高 明	贾绍云	董艳平

特邀委员 王久长 刘梦成

主	编	陈永周	王久长
副	主 编	李丽萍	
特	约编辑	刘梦成	

目 录

难忘的岁月	孙峻声(1)
依依情深忆征途	张克伦(22)
赵定远同志的几件事	杨明军(122)
我与《文艺精华》	谢 琰(125)
我的狱中生活	杜树桢(129)
十年“文革”亲历记	谢 琰(142)
洛阳曲剧史话(第三、四章)	李振山(176)
淡调朱墨写花魂 ——记西工区政协常委、画家贾万友	任宗岳(262)
梅花香自苦寒来 ——记西工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贾建民	陈永周(269)
开源节流巧理财 ——记西工区财政局长金瑞生	李永庆 杨爱华(277)
洛阳婚俗的变化	耿 彤(288)

难忘的岁月

孙峻声

一 我的启蒙老师

1916年6月1日,我出生在河南洛宁县西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村里茂林修竹,人烟稠密,地主当权,豪绅横行。我从小亲眼看到了压迫和剥削者的残酷与狠毒,也感受到了被压迫、被剥削者的苦难与反抗。

那时候学校少,就学难,穷人家的孩子就学更难。

1931年元月,我考进了设在王范镇的县立第四小学。这是一所声誉不亚于县立一小的新建学校。学生来自全县,教师则大多是洛阳第四师范毕业的学生。我入该校之前,共青团员赵筱则就是该校受全体师生喜爱的语文教师。赵老师思想进步,对人热情、诚恳,能像磁石一样把师生团结在自己周围。我进入该校后,正好赵筱则做了我的级任教师。他经常对学生讲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,启示我们:反压迫、反剥削。

不久,第四师范毕业的董辉亭、马秀山等也到四小教书。这些进步老师一到校,四小的政治空气和学习气氛更趋活跃,墙报呀、诗歌朗诵呀、作文比赛呀,都搞得有声有色。赵筱则老师教我们唱国际歌、唱少年先锋队歌,还介绍我看苏联小说《铁流》《被收买的生命》《奴隶》,还有中国作家《蒋光慈全集》以及丁玲的作品。在他的影响和

教育下,我逐渐明白要消除压迫、剥削,就必须推翻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。这些逐渐形成了一种信念,像种子一样,深深地播种在我幼稚的心田里。我以后能走上革命的道路,就是这颗种子的力量,而这颗种子就是赵筱则播种的。虽然赵筱则后来在革命的烈火中没经起考验当了叛徒,但他仍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二 踏上革命征途

1932年冬,我从四小毕业后,因家庭经济困难,辍学在家。适值原在县中教书、后以思想左倾而被解聘的王瘦梅老师应聘到我村教学,我在王老师处学习了半年,不仅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,而且在他的影响下,我向往光明、要求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。他曾悲愤地告诉我们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他和北京大学同学南下请愿示威,遭到反动政府迫害枪杀的情形,提醒我们不能对反动派抱任何幻想。要不当亡国奴,享受人的权利,只有起来反抗。他的教导,增加了我踏上革命征途的决心。

次年暑假,王老师回北京续学,我又失学了。但火种在胸膛里燃烧,我是不甘心沉默的。

1933年秋,刚从开封监狱里被组织营救出来的地下党员马光宗(后变成叛徒)回到了家里,他把我村西沟的失学青年组织到他的场房屋里学习进步书报,引导我们走向光明。马光宗还经常和张宝斋等一起到温旭阳处秘密开会。我们也从他那里间接听到一些温旭阳关于革命理论的教育,这对我后来踏上革命征途是起了一定作用的。

1933年冬,雷魁升同志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农会简

章,他把我叫到他家一起学习,我们一致认识到要解除农民痛苦,农民必须起来组织农会。团结就是力量,有了力量就能反抗,就能叫地主阶级害怕、让步。

不久我们联络了三四十人。1934年,我们西王村农会正式成立了。农会会员很快增加到800余人,公推孙永兴为农会会长,雷魁升管组织,孙峻声管宣传,孙斌管经济。首先开展半减租减息斗争,斗争对象第一个是地主恶霸孙思义。贫苦农民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,这在当时是造反行为,广大群众怀着惊奇而又愤怒的心情,在刘磨拴率领下,在前头闹与孙思义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和斗争。结果孙思义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,答应了群众的要求。群众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,第一次体会到要活命只有斗争。这次斗争的胜利,大长了贫雇农民的志气,大杀了地主恶霸的威风。赵村恶霸地主贺长升、樊村大财主张金鼎等不久到西王村来讨租,慑于农会会员和地主斗争的浩大声势,也不敢强硬,只得乖乖地照农会意见减了租。从此,地主不敢欠长工的工钱,佃农也稍微减轻了点稞租,农会在村里成了最高权力机关,一切都是农会说了算,夫妇吵架也要到农会评理。影响所及,东王村、张营、王召、大原等村也都陆续建立了农会。我和魁升等日夜奔忙,不知疲劳,我意识到自己踏上了革命征途,决心不管征途多么艰险,也要走下去。

三 西王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

我们村的农会从1934年成立到1936年,做了许多群众高兴、敌人害怕的事情,政治影响是很大的。地主恶霸把农会视为眼中钉,反动政府把农会当作肉中刺。1936

年10月,国民党县党部以我们农会里有异党分子活动为由,派李万轩带领人到我村开会宣布说:“农会是非法组织,立即解散。”就这样,我们赖以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机构被解散了。虽然农会解散了,但农会原来的骨干并没有解散,我们团结得更紧了,我们的要求更高:加入共产党!

1937年元月的一个夜晚,鸡不叫,狗不咬,劳累了一天的人们,已经进入梦乡,但雷振都家的小屋里却有四个青年人,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,在雷魁升同志的主持下,举起右手,庄严宣誓:“……我愿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!”这四个青年人是孙峻声、雷振都、孙鸿升(后脱党)、李茂松(后被捕自首)。我们入党了,我们是党的儿子,党叫我们干啥,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3月份雷魁升同志在王家祠堂东山墙后一个麦秸垛旁召集党员孙景川、孙峻声、孙鸿升、李茂松、李殿聚等开会,成立党支部,推选雷魁升同志为支部书记。布置从当月起交党费,并研究发展组织,选择培养对象。决定第一批培养对象是刘磨拴、李耀宗、孙更全。4月份党员会议上刘磨拴、李耀宗被批准为党员。贺录虎、程明、王有邦也是4月份入党的。为了扩大影响,开展对敌斗争,雷魁升同志提出向邻村发展组织的意见,并作了具体分工。我负责张营、马营两村,李殿聚负责东王村。到1938年4月,仍由雷魁升同志主持支部会议,通过东王村的贾景堂、张福昌、党炳坤为党员。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,我们同时也开展了对敌斗争。第一个战役就是1938年冬天的抗差斗争。

这次斗争是在我们西王村党支部组织领导下发动的。斗争目标是联保处,理由是联保处派差不公。当我

们把联保主任孙成申辩论得理屈词穷、无言以对时，他恼羞成怒，便指使其狗腿子向我大打出手；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，把他们打得鼻青眼肿，落花流水，对联保处的大门都被群众砸坏了。联保处慑于群众的威力，被迫从西王村搬到东王村寨上。

1938年冬，抗差斗争刚刚胜利结束，组织上派雷魁升同志到西安“中央军校七分校”学习，村里党的领导工作由孙景川同志负责。这时党组织更壮大了。西王村有孙峻声等12名党员。张营也建立了党支部，由张福昌负责。东王村支部书记是贾景堂。陈宋、寨子支部书记是党炳坤。到1939年，中共西王村区委成立了，孙双莲同志任区委书记。当时陈吴的党员有张学礼、张耀彤等。涧口的党员有刘祖式、杨志礼、段振坤等。王范的党员有张更亮、李廷坤等。城关的党员有李景林（后脱党），寨里党员有李尚德等。崧山党员有程文庆、李干卿（后叛变）等。史村党员有程银平。我们这些地下党员和地下党支部，尽管活动都是秘密的，但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睡觉，他们罪恶的魔掌时刻在准备着向我们伸来。

四 魔爪伸向我们

1939年农历12月22日，孙双莲把刘磨拴、孙景川和我叫到他家里开会，决定次晚在他家后窑里召开党员大会，了解情况，并布置工作。第二天我一吃晚饭，就向双莲家走去。路过学校门口时，因天还不黑，我就先到学校，同孙永兴、孙光斗、孙景川、孙茂堂、孙永超等一起烤火说笑。正在这时，孙永超的父亲孙有望神色紧张地跑来对我们说：“县里来了许多人，把孙双莲家大门围了起

来,说孙双莲是共产党,要抓人哩,你们还不快跑。”我一听,马上跑到西沟,通知原更申,叫他赶快通知刘磨拴、贺灵伟等跑到雷振都家崖圪广场寨墙根的玉谷秆里躲起来,叫雷振都的哥哥雷振海到东沟探听消息。恰好这天孙双莲到王范去了不在家,李万轩率领警丁在双莲家左右邻舍一直搜到夜里七八点钟,没有搜到双莲,这才悻悻而去。我们西沟几个党员,为了避免敌人搜捕,都各自隐蔽了起来。我当夜到土桥我三姐家住了一天,又转移到樊村、坡头几家亲戚家躲避。听说敌人一连几天夜里都到村里抓人,把我党的外围组织——“读书会”的青年学生孙建兴、孙茂堂、孙中玲、雷殿升等八人也抓去了。腊月三十夜,我悄悄回到家里。年初一早上我父亲早起解手,发现大门外有十几个彪形大汉把守,便匆匆回来叫我速走,于是我翻墙出走。凶恶而愚笨的敌人,虽然魔掌伸得很长,但几个党员却都安然无恙,一个也没有被他们抓走。我们仍然在发展组织,壮大自己,和敌人争夺阵地。1940年,孙双莲代表组织,决定调李茂松到宜阳王脊联络点教书,派我接任李茂松原来的工作,在我村西沟教书。派孙景川在我村东沟教书。我和本村恶霸杜西卿的弟弟杜建中争夺一个学校,孙景川在东沟和孙永兴争夺一个学校,争夺的结果,我和孙景川都是和对手平分秋色,各分一个学校。有了学校,就有了宣传阵地。我们把学校当作土壤,我们要在这块土壤上,撒下共产主义的种子,培养共产主义的苗。开学后,我同孙景川研究,把我从新五军带回来的《党员课本》《战时课本》(我是被新五军子弟学校党组织派回来的)抄在黑板上,叫学生抄读。另外杜建中、孙永兴两个学校觉得新鲜,也来抄读。无形中也

替我们作了宣传、播种工作。这学期我们不但做了启蒙工作,放麦假时我和孙景川还分别介绍了马三元、孙振起、田成志、孙培起、孙茂堂等五人加入了党组织。

敌人是永远不会忘记消灭我们的,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向我们下毒手。1941年放寒假后,县政府张贴布告公开招考联保主任,为了和敌人争夺政权,经组织研究决定叫孙景川同志去应考。景川本不愿去考,但组织上既然已作出决定,他不但去考了,而且考的结果还名列前茅。这就堵住了地主子弟孙永兴、孙光斗等人升官发财的去路。为了搬掉他们前进的绊脚石,孙永兴等的后台孙向贤(国民党区分部书记)、孙思温等向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密告说孙景川是共产党。因此孙景川在1942年元月5日到县领取委任状时被捕了。孙景川被捕后的第二天,就被送到西安劳动营。过罢灯节,刚刚开学,我的学校也被解散了。在宜阳王圈教书的李茂松刚到校,也被敌人抓走,送入西安劳动营去了。我村的村政权至此又被反动势力全部控制。

1942年2月,经区党委负责人党炳坤同志同意,我到小原村教书,但不到一年,学校又被恶霸张笃恭之弟张士全所霸占。我失业了。

五 以身许党 矢志革命

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,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愈加坚定。在社会上我虽然失掉了合法的工作岗位,但我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。一有机会,我就为党的事业工作。1944年12月,我因家贫无力缴纳保甲经费,被抓进赵村乡公所,幸蒙同学张遂喜搭救,才获释放。我被

释后,当晚宿在樊村寨我姐夫贺其超处的上房西间里,而这里恰是国民党地方武装游击队的大队部。夜里10点钟,我忽然听到大队副曹景祥在东间开会。曹说:“贺树三给住在中山镇的县长李洁庵打电话说,八路军已渡过黄河,到达新安、渑池、洛宁河底一带。李县长指示我们大队立即开到洛河沿布防。”我在睡梦中听到这个消息,又惊又喜,兴奋得再也睡不着。天一亮,我就到广阳村,一进王满治家的大门,首先见到张万一,我气喘吁吁地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,告诉他和在旁边的王志杰、王满治。志杰马上去通知郭中立同志,并派人通知党炳坤、贾景堂同志到满治家来研究新形势,准备迎接新任务。他们来后,决定派党炳坤、贾景堂潜伏河底,找上级领导联系,请求任务。他俩到河底见到了贺崇升、刘聚奎、韩钧。领导对他俩予以鼓励,还发给一部份文件,指示他们回去同各处组织恢复联系,开展活动,迎接部队南下,开辟洛河南工作。除夕夜,他俩回来,大家在雷振都家秘密开会,分析、研究了每个党员的情况,决定恢复西王村党支部,支部工作由我和刘磨拴同志负责,恢复贺灵虎、程明的组织关系。散会后,已万籁俱寂,更深夜静,我们冒着风雪,把从河底带回的传单、布告贴在下沟火神庙上,还刷写了许多标语。第二天,人们一看到这些带有战斗性的宣传品,都感到很新奇,一时气氛紧张起来。

革命形势在不断发展,新的革命形势,需要更多的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为之工作。1945年春节后,党炳坤同志根据指示,动员杨志英、党铁虎、宋恒生、马三元到豫西公学去学习。过完灯节,又调我到洛宁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工作。我以能参加正式革命队伍而感到由衷的兴

奋,决心要为党好好工作。当时奉调到县抗日政府报到的有十几个人。为了避免敌人注意,我们化整为零,分批行动。我带着铁儒和雷文彩二人到设在黄沟村的抗日政府报到。到抗日政府后,见到了县长康润民、贺成解,他们把我分在秘书室工作,铁儒和文彩分到财粮科工作。不久,我被任命为公安局长,把警卫班改为公安队,我掌握了人民武装,感到对敌斗争更有胆力了。

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,县抗日政府在河底镇召开了庆祝大会。当天下午3点钟,领导上叫我带领武装队员数人,把犯人押送到渑池地区公安处。公安处长胡立声同我谈话之后,对我说,情况变化,豫西根据地 will 向黄河北岸撤退,不让我再回洛宁,并叫我在公安处任秘书,和党书经共同负责案犯工作。

过河后,我们把犯人交给王屋县公安局。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,我向地委副书记兼专员贺崇升要求参加学习。他同意了我的要求,并写信介绍我到豫西公学报到。学习期限三个月,我在学习期间担任支部宣传委员兼九班班长。学习结束后,分配我到济源县杜八联坡头镇搞群运试点工作,我任点长,徐元卿任支部书记。1945年12月我又被调到济源县公安局担任秘书。1946年底,豫西干部集中到山西阳城河北口学习,准备再开辟豫西工作,我也参加了学习。当时学习是紧张的,条件是艰苦的,但为革命而学,为解放豫西而学,为解放全中国而学,谁也没叫过苦,真正是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

六 在暴风雨中战斗

1947年春,豫西干部几百人编成三个中队,集中到山

西阳城河北口学习之后,枕戈待旦,准备打回老家去。正好中原突围的李先念、王震、王树声,为了到豫西和陕南建立根据地,特电请中央要豫西干部。但情况不时在变化,我们准备了三次,都未能飞渡黄河。广大干部正为白白吃着人民的小米而不安的时候,中央下达了豫西干部随军解放晋南的命令。我军指战员胸有革命火种,广大豫西干部配合得力,解放晋南,势如破竹,像秋风扫落叶一样,一举解放了 11 个县城(曲沃、绛州、稷山、河津、禹门、荣河、万泉、临猗、绛县、翼城、候马等)。这就使太原的阎锡山闻风丧胆,坐不安席,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方官吏,大多丢盔抛甲,弃城而逃。记得我们攻进绛州城时,县政府的窗口架着机枪,但没一个人。日、阎、伪币堆积如山,但无人理睬。日寇的牛肉罐头、海带、紫菜堆满几十个仓库,也无人管。曲书城任县长,吴豪任县委书记,我被任命为民运部副部长。我们 20 余位同志全力以赴地发动群众,每天开仓救济穷苦百姓,拆除城墙,维持治安,建立革命政权。这里刚刚打开局面,我们豫西干部和武工队又奉命到万泉、荣河、临猗等县参加剿匪反霸运动。这是与拿枪的敌人和不拿枪的敌人明争暗斗的拼搏。斗争是残酷和危险的,稍一大意,就会遭到敌人的暗算,但那时没人害怕。同年 7 月,我们豫西干部奉命把剿匪反霸工作移交临汾地区,然后和山西一部分干部集中到阳高泉村,听打过黄河、二次解放豫西的动员报告。所有的干部都欢腾雀跃,高唱着《打回老家去》的歌子。陈赓司令员、谢富治政委和豫西工委书记刘道安、专员贺崇升等都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。刘道安在讲话中对豫西人的特点作了这样画龙点睛的介绍:“……豫西人都

是红脸汉，讲义气，爱朋友，为朋友可以豁出性命。也爱主持正义，常常会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翻过来说，那里也是出土匪的地方，真正杀人越货的惯匪是少数，多数是官逼民反、不得不反的绿林英雄，只要我们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，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，争取为我所用，解放豫西是完全可能的。”刘书记的讲话，对豫西干部是个巨大的鼓舞，不但增加了责任感，而且增加了自豪感。那些山西干部对豫西人“野蛮”、“落后”的看法也有所改变。

经过思想动员和战斗准备，广大干部、战士气鼓得足足的，于8月5日下午我们向黄河北岸的河南济源县出发了。出发不到20里，突然天降大雨，但队伍并没因雨而减低速度，我们和部队一起在狂风暴雨中急行军，真是胸有熊熊烈火，哪怕风狂雨猛。当部队踏着泥泞行进到济源县盘古山头的时候，因雨大风疾，山路窄滑，一匹驮着大炮的战马，一脚踏空，跌入深沟。战士们把绑腿结起来，将几个战士系下深沟，把大炮从马身上解下来。这匹南征北战的战马，为革命光荣牺牲了，几个战士像对牺牲的战友一样，默默地行了军礼之后，把完好的大炮抬上来，又继续前进了。一直到吃晚饭时，部队到达了大社村住下。当日雨止，吃过晚饭，我们又随部队夜行军。到风门口时，国民党飞机投下了一颗照明弹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前委传下命令：停止前进，就地卧倒。几分钟后，队伍又继续前进了。夜12时，队伍到达黄河渡口，正在登船南渡，敌机又投下了三颗照明弹，但仍然没能阻止大军南渡。当大军渡过天堑黄河，到达澠池石村时，正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时候，虽然有些疲累，但大家是多么兴奋呀，我们又回来了，灾难深重的家乡啊，为了要把您从苦难中

解救出来，我们带着仇恨、带着热爱又回到你的怀抱里了。

过河后，部队直向新安县的曹村挺进，天气时雨时晴，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投掷炸弹。但这都妨碍不了我们的前进。8月7日下午5时，我们到达了新安的铁门镇。风停雨止，天从人愿，老百姓说：“天意归顺，民心所向，国民党气数已尽，共产党坐天下已成定局。”

部队到铁门后，人不卸装，马不下鞍，稍事休息，除干部停下待命外，部队兵分两路，一支南进洛宁，一支向陕、灵挺进。等部队出发后，干部队第二天也同部队一样分西、南两队出发。我参加南队，向洛宁、宜阳前进。

1945年7月15日，我们洛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撤离洛宁河底镇，时隔两年后又回来了，老乡们看见自己的亲人又回来了，那种久别重逢的亲热劲儿，使我们感动得禁不住泪下，但是重任在身，不敢久停，在河底仅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就向大门楼宿营地出发了。

七 攻开杨坡寨 处决反革命

大门楼和洛宁县城之间，有个重镇叫杨坡，这个镇有一圈坚固的土寨墙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寨内有千来户人家，当时地方土匪头目王杰三（即王麻子）、张元，陕县剿共司令李云彩，还有河北民军张荫梧部下一个团，共数百人，凭险据守，负隅顽抗，我部奉命包围该寨，决心拔掉这个钉子。我们干部也随军作战，为了避免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损失，迫使敌顽举手投降，李耀参谋长特请洛宁县委书记贺成解、县长曲书城接通电话，对敌酋说明我军对放下武器敌人的优待政策，劝其认清形势，立即投降。但